

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中外互动的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时，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还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瞰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必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分别长远与现实，尤其要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自古以来，中国的经验是“内圣而外王”，这在今天仍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外交实力的考验，也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时机。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中，应该说更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外交观念中，它以历史的积淀和新的实践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我国的外交战略作了新的论述，其要点是：(1)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2)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5)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6)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7)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8)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八点基本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这表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错综复杂，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即在几年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决定大国博弈最终结果的，归根到底还是各国内部的发展。如何在当今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为实现国内的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收稿日期 2019-07-13

作者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80。

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和辉煌成就

武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习近平信贺：《欢迎真知灼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历程，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都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计划经济时期；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新时期；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发展基础

70 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瞬间。但是，中国人民在这 70 年里，却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在经济上，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选择工业化道路的时候，有三大因素影响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是国家安全和统一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

湾并随后签订了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又爆发了越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4.4万架飞机（战争前夕，苏联的工业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7.6%）；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均每两个月建成一艘航母，每年生产4万架飞机、2万辆坦克（工业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8.7%）；日本1937年工业产值占世界的4%，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每年可造2000架飞机，二战期间，生产了吨位庞大的航母舰队；而中国工业生产仅占世界总量的0.3%，一辆坦克、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防工业的极度薄弱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和统一。因此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来欺侮我们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607页）

第二是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5.4亿人口中，4.8亿是农民。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2.65亩，每人年均粮食仅209公斤。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调查中也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由于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在传统农业为主的条件下，中国当时确实陷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因此主要依靠农业提供资本积累，在个体经济下就面临着很大困难。1952年中国才有了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财政收入97.69亿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1.09亿美元；货币供应量仅27.5亿元人民币；再从人民生活来看，195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7元；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收入为445元。当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6元（以上数据为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单位，数据是采用的国家统计局折算数据）。

第三是重工业严重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问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的原煤、原油、发电量、生铁、钢、水泥总产量与美国相比，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3.63倍、2074.33倍、80.26倍、199.28倍、447.72倍、54.45倍，人均产量美国则分别是中国的49.47倍、7531.46倍、291.39倍、723.54倍、1625.58倍、197.71倍（资料来源：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1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本文计算人均数量用到的人口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数据参见《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美国人口数据参见<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estimates/nation/popclockest.txt>）。即使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小时。拿钢产量来说，尽管1952年已经是1949年的3倍，但是同期美国的钢产量仍然是中国的57倍，人均产量则是中国的224倍。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由于上述三大因素的影响，出于尽快建立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和保障低收入下实行高积累政策并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以及尽快补上重工业这个短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不仅制造出“两弹一星”，保证了国家安全，而且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善了

工业布局,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改革开放开启了致富之门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保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并在短短的 20 多年里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它的另一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没有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全国职工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 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 624 元,1976 年下降到 575 元(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不升反降,少了 49 元。上海 180 万住户中,住房困难户 90 万户,其中人均居住 2 平米以下的 268 650 户,占将近 1/6。在农村,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

再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西德一个年产 500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 2000 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 16 万工人,相差 80 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 2.5 万千瓦,职工只有 12 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 2.6 万千瓦,职工却有 298 人,高出 20 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 350 万吨钢只需 7000 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 230 万吨,却需要 67 000 工人,相差 14.5 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 60 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工厂时,该厂刚引入了机器人生产线,使之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生产厂。在参观过程中,邓小平得知该厂人均每年汽车生产量为 94 辆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工厂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 93 辆。在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发表即席讲话中提到:“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于青:《谋划发展蓝图的一次考察——“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人民日报》,2008 年 11 月 28 日,第 6 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出发,6 月 6 日回国,行程 36 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 20 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宋晓明、刘蔚主编:《追寻 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8 页)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时期,改革开放不仅充分调动了国内的各种积极因素,发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有为之手,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灵活之手,优化了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低价的优势;而且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得 1978 年至 2012 年 34 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接近 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1978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3 624 亿元,居世界第十一位;1986 年突破 1 万亿元,居世界第九位;2000 年突破 10 万亿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 年突破 40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在对外贸易方面,也获得了飞速发展,1977 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 148 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 196 亿美元;而到 2012 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 38 668 亿美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

城市化率也由 1978 年的 17.78% 提高到 2012 年的 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大陆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市民为主的社会。

三 新时代新发展

根据 2018 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的 GDP 已经达到 90 万亿元，人均 64 644 元；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 万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82.5 万亿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3.07 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 182.7 万亿元。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228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 41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 617 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9 853 元。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2017 年数据，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 131 735.85 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位，超过排在第三至第五的日本、德国、英国三国之“和”（111 698.47 亿美元）。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确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面临着三大转变：（1）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2）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3）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还面临着如下困难和挑战：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严重，存在金融风险；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但是，相对于不利因素和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具备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1）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2）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避免双重失灵；（3）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4）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5）中国人民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高储蓄率）。

新中国 70 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还如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全世界。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且通过首倡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在世界的发展、稳定和公平方面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所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9～80 页）

结 语

历史需要沉淀，历史也需要比较和反思。回首 70 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甚至再往上回顾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 1845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收稿日期 2019-07-10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

【责任编辑 翁有为】